

四編 南京大學特輯 7

從新文化公共空間到 黨派「自己的園地」

《民國日報·覺悟》研究
史建國·著

民國文化與
文學研究文叢

李怡
沈衛威◎主編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新文化 民國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叢文

四編：南京大學特輯

李怡 沈衛威 主編

第 7 冊

從新文化公共空間到黨派「自己的園地」
——《民國日報·覺悟》研究

史建國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新文化公共空間到黨派「自己的園地」——《民國日報·覺悟》研究／史建國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2+190 面；19×26 公分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四編；第 7 冊)

ISBN 978-986-322-801-1 (精裝)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541.26208

103012902

特邀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 帆	王德威	宋如珊
岩佐昌暲	奚 密	張中良
張堂錡	張福貴	須文蔚
馮 鐵	劉秀美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四 編 第 七 冊

ISBN：978-986-322-801-1

從新文化公共空間到黨派「自己的園地」

——《民國日報·覺悟》研究

作 者 史建國

主 編 李怡 沈衛威

企 劃 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四編 12 冊 (精裝) 新台幣 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從新文化公共空間到黨派「自己的園地」
——《民國日報·覺悟》研究

史建國 著

作者簡介

史建國，1981年2月生，山東臨朐人。2009年6月畢業於南京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期間於2007年10月～2008年10月入選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計劃，赴德國波鴻魯爾大學聯合培養一年。2009年起，任職於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目前主持或參與省部級、國家級科研項目多項，已在海內外刊學術物發表論文30餘篇，出版專著1部、譯著1部（第二譯者），參撰教材1部。

提 要

《民國日報·覺悟》是五四時期影響巨大的「四大副刊」之一，本書試圖將其放置在思想史的視野中來考量其對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貢獻。儘管附刊於一黨之機關報，是所謂「黨報副刊」，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語境中《覺悟》卻並不黨同伐異。在「集思廣益」的辦刊方針指引下，它致力於推動新思潮發展和中國固有文化革新，儼然成了一塊探討新文化的公共空間。考察《覺悟》的歷史可以發現，對開放性辦刊方針的堅持、對副刊相對獨立性的堅守以及時代主潮的影響是其雖然身為黨報副刊卻獲得良好發展態勢的主要原因，而當其淪為宣傳黨見的輿論工具、成為一黨一派「自己的園地」時，《覺悟》的新文化使命就趨於終結、同時刊物本身也難以為繼了。本書對《覺悟》誕生的來龍去脈以及《覺悟》上對一些問題的討論展開分析，展示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表現。同時，針對編輯者的風格和特色、以及欄目設置等問題也予以探討；有鑒於《覺悟》的主編者和重要作者與高校（浙一師——復旦大學）的緊密關係，本書也將引入大學文化來對其中的某些現象進行解讀；而《覺悟》的編輯更迭以及「轉向」以往研究不多，本書也擬對其略作論述，以揭示許紹棣、陳德徵這批《覺悟》扶持起來的「新青年」在他們掌握了《覺悟》的主編大權後是怎樣對《覺悟》進行改造的。正是在他們手中《覺悟》最終完成了從一個傳播新文化的公共空間到一個專制政黨「自己的園地」的轉變。



目

次

引 論	1
第一章 五四運動與《覺悟》的誕生	17
第一節 救亡、娛樂與啓蒙 ——《覺悟》之前的《民國日報》副刊	18
第二節 回應、疏離與歸依 ——新文化運動與《民國日報·覺悟》的 誕生	26
第二章 「四大副刊」之一 ——漸成新文化重鎮的《覺悟》	39
第一節 「集思廣益」 ——作為新文化公共空間的《覺悟》	39
第二節 「解放」與「改造」 ——婦女解放與婚姻自由問題的討論	47
第三節 優待學生與反對版權 ——五四新文化大眾化的努力	57
第四節 如何批評 ——「嗚呼蘇梅」公案與文章署名問題的 論爭	67
第三章 另一種「一校一刊」的結合 ——復旦大學與《覺悟》作者群	77
第一節 「青年導師」——邵力子與《覺悟》	78
第二節 「小鳳」長鳴——葉楚傖與《覺悟》	89
第三節 「白屋詩人」——劉大白與《覺悟》	99
第四節 「修辭之父」——陳望道與《覺悟》	109
第四章 《覺悟》與五四新文學	119
第一節 無心插柳柳成蔭 ——《覺悟》與新文學建設	119
第二節 星星之火待燎原 ——《覺悟》與革命文學之濫觴	134
結語：《覺悟》轉向與新文化使命的終結	149
第一節 編輯更迭與《覺悟》的「轉向」	149
第二節 陳德徵與《覺悟》	158
附 錄	169
參考文獻	181
後 記	189

引 論

現代報紙文藝副刊與文藝雜誌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和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對中國近現代報紙文藝副刊和文學雜誌的研究也已經成爲近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現代文學史上一些著名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新月》、《現代》、《現代評論》、《月月小說》、《小說月報》、《紫羅蘭》、《文學季刊》、《晨報副刊》、《京報副刊》、《大公報》……等等均有一篇甚至多篇博（碩）士論文對其進行探討，其它單篇研究論文或專著也屢見不鮮。之所以出現這一情況，一方面是由於研究界重視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呼聲越來越高，另一方面這也表明了一種尋求突破既有的文學史敘述模式、力圖展示一種原生態文學史場景的努力。如果把原生態的文學史現場比作一片茂密的森林的話〔註1〕，那麼其中起著主要支撐作用的經典作家作品就是一株株俊秀挺拔的參天大樹，而在這些參天大樹的周圍同時也遍佈著小樹、灌木叢甚至雜草。正是有了周圍這些小樹、灌木甚至雜草的襯托，參天大樹才成其爲參天大樹。並且參天大樹也是由小樹一步步長成的，並非一出現就挺拔健碩、卓爾不凡。應該說一部文學史，是由小樹、灌木、雜草和參天大樹共同展現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文學史已經遠離了文學史的現場，因此必定會遮蔽文學史本應具有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而一廂情願地變得單一、簡單。在這個意義上，那些歷史的見證——泛黃的現代報紙文藝副刊和文學雜誌就成了我們進入文學史現場，體會其生動性、豐富性的最好工具。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當我們從報紙文藝副刊進入新文學

〔註1〕「森林說」，參見沈衛威：《「學衡派」譜系·後記》，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史的航道，和從單行本進入新文學史的航道時，景觀是不一樣的。我們由報紙文藝副刊進入的是一個原生態的歷史野地，看到的是未經篩選、淘洗過的成熟或不成熟的作品，新文學生成過程中的稚嫩、新鮮，以及不可避免的淺薄，都呈現於此。而我們由單行本進入的是一個經過篩選的秩序化、等級化了的文學史狀態。文學史家在進行作品集的選集過程中，由於種種因素（這些因素在今人看來有些是可知的，有些是不可知的）的作用，還做不到歷史的客觀。」「……由現代報紙文藝副刊，我們想進入的是一個原生態的新文學生成過程，並試圖回到在後設文學史話語裏已經消失的『文學現場』，貼近活著的文學歷史，重建已經消失的『文學史現場』，這是我們研究現代報紙文藝副刊所採取的文學史立場」（註2）

再者，大眾傳媒的極速擴張，以及它所帶來的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巨大衝擊，也越來越喚起人們對其存在、影響、甚至「魔力」的關注，進而促使人們由此回望在歷史上它所曾經扮演過的角色。陳平原先生在論述媒體的巨大影響時寫道：「『媒體帝國』操縱人類生活這樣的寓言故事，或許有些危言聳聽，但起碼也應承認一點：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情感體驗乃至思維與表達能力等，都與大眾傳媒發生極大糾葛。大眾傳媒在建構『國民意識』、製造『時尚』與『潮流』的同時，也在創造『現代文學』。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現代文學』之不同於『古典文學』，除了眾所周知的思想意識、審美趣味、語言工具等，還與其生產過程以及發表形式密切相關。換句話說，在文學創作中，報章等大眾傳媒不僅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寫作者的思維與表達。」因此，陳先生強調：「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大眾傳媒，不僅僅是新聞史家或媒體工作者的責任，更吸引了無數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學史家的目光。」

（註3）

就文學研究來說，儘管傳媒對新文學的產生和發展所起的作用顯而易見，並且引起了眾多研究者的廣泛重視，但具體到研究實踐，其難度還是相當大的。作為新文學載體的報紙副刊和文學雜誌，它們在編輯方式和發行方式上各具自己的獨特性，而且編輯者的編輯理念和辦刊方針也各有不同，所

〔註2〕 雷世文：《現代報紙文藝副刊的原生態文學史圖景》，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1期。

〔註3〕 陳平原：《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以北大諸君的學術思路為中心》，見《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陳平原、山口守編），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562頁。

有這些都直接影響到了新文學的成長，甚至影響到了某些特定文體的出現和發展。因此，從理論上講，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報紙副刊與文學雜誌在推動新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差異性應當是比較明顯的。一般說來雜誌較報紙的周期長，可分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雙月刊、季刊等等，並且印裝成冊，易於保存。它所擁有的較長的周期決定了其所能承載的文章篇幅也較報紙文字長，因而能夠從容地針對一些話題展開討論。而報紙副刊由於其篇幅限制，所載的文字一般短小精悍，針對性強。同時，因為發行周期短，流動性強，也更容易形成編讀互動，能夠更迅速地對一些事件做出反應，在推動新文學發展方面有著文學雜誌所不能取代的特殊作用。但在實際上，包括五四時期著名的「四大副刊」在內的中國現代報紙副刊在保有日報副刊的獨特性的同時，卻也有著「雜誌化」的傾向，這使得報紙副刊同雜誌的區分並沒有那麼明顯。當然也許正是因為其「雜誌化」傾向，才使得它們在新文化運動中大顯身手，扮演了同《新青年》、《新潮》等雜誌類似的角色，成就為公認的「四大副刊」。曾經主編過「四大副刊」其二，即《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的孫伏園在接辦《京報副刊》伊始，就對當時報紙副刊的編輯現狀進行了評論並對自己理想中的報紙副刊（他用了「附張」一詞）作了描述。他寫道：「……什麼是我理想中的日報附張呢？我們應先知道什麼才是今日中國社會對於日報附張的需要。」接下來，他結合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分析，一方面對副刊雜誌化的現實有所不滿，認為應當保留副刊的特色，另一方面在當時的情勢下副刊雜誌化又是不可避免的，即副刊必須服從「今日中國社會對於日報附張的需要」：「大戰終了以後，無論在世界上或在中國，人們心理中都存著一種懷疑，以為從前生活的途徑大抵是瞎碰來的，此後須得另尋新知識，作我們生活的指導。這時候日報上討論學問的文章便增加了。不過，大多數人盡可有這樣的要求，日報到底還是日報，日報的附張到底替代不了講義與教科書的。廚川白村說得好，報章雜誌只供給人以興味，研究學問需用書籍，從報紙雜誌上研究學問是徒勞的。而在中國，雜誌又如此之少，專門雜誌更少了，日報的附張於是又須代替一部分雜誌的工作。例如宗教、哲學、科學、文學、美術等，本來都應該有專門雜誌，而現在《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北京《晨報》的《副刊》和將來的本刊，大抵是兼收並蓄的。一面要兼收並蓄，一面卻要避去教科書或講義式的艱深沉悶的弊病，所以此後我們對於各項學術。除了與日常生活有關的、

引人研究之興趣的或至少艱深的學術而能用平易有趣之筆表達的，一概從少登載……」〔註4〕儘管副刊的性質決定了它無法取代雜誌和教科書，但在當時文化啓蒙的浪潮中，一種歷史的使命感卻又讓以「四大副刊」爲代表的眾多報紙副刊勇敢地「越俎代庖」，部分地充當了雜誌和教科書。正如孫伏園在上面所引的那篇《理想中的日報附張》中所說的，完全可以把「四大副刊」的「合訂本當作雜誌看」。既然每日出版的副刊又逐月彙訂成「合訂本」發行，那麼在編輯過程中的內容選擇、版式設計等方面便都要考慮到合訂本的需要（實際上「四大副刊」的編輯者也都是這麼做的），副刊合訂本的出現實際上代表了編輯對於副刊雜誌化的一種有意識的追求。而事實上，當時的許多「覺悟」了的新青年，也的確將「四大副刊」當作教科書和雜誌來讀，從中獲得精神養料，指導自己的人生選擇。蘇雪林後來回憶當年在北平讀書親身感受新文化運動的情況時寫道，「我到北京的那一年，正值五四運動發生未久，我們在講堂上所接受的雖還是說文的研究，唐詩的格律，而我們心靈已整個地捲入那奔騰澎湃的新文化怒潮，每天我們都可以讀到許多有關新文化運動的報紙副刊，周期性的雜誌，各色各樣的小冊。每天我們都可以從這些精神糧食裏獲取一點營養料，每天我們都可以從名人演講裏，戲劇宣傳裏，各會社的宣言裏得到一點新刺激，一點新鼓動。」〔註5〕在此，蘇雪林甚至把「有關新文化運動的報紙副刊」放在了「周期性的雜誌」前面，足見當時新文化運動報紙副刊的啓蒙意義和教化作用之大。其身兼報紙副刊和定期雜誌兩方面的特色，是單純的雜誌所不能比擬的。很簡單，一個人也許沒有耐心一口氣讀完一本刊有長篇論文的雜誌，但要讀完一張日報副刊卻是輕鬆得多，而儘管副刊上也可能會有分節連載的長篇論文，但這種分節的方式最起碼免去了長時間集中閱讀的疲倦感。

其實關於究竟「何爲副刊」以及中國報紙的副刊源於何時等問題，直到今天在研究界也一直有著種種爭議。〔註6〕副刊研究者馮並主張副刊是中國所獨有的現象，結合中國報紙「副刊」稱謂出現的歷史，他寫道：「表面看來，

〔註4〕孫伏園：《理想中的日報附張》，載《京報副刊》1924年12月5日第2版。

〔註5〕蘇雪林：《我的學生時代》，見《蘇雪林文集》（卷二），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61頁。

〔註6〕目前一種意見認爲中國最早的副刊是附於《申報》的通俗小報《民報》，另一些學者則認爲《字林滬報》附出的《消聞報》才是中國第一份正式的報紙副刊。

副刊的稱謂信手偶得，其沿用卻表明了一種必然性。附刊只是報紙的外在發行形式，副刊則點明了它和報紙『正張』的內在辯證關係。副——佐於報紙，副而成其為刊——有相對獨立的編輯形態。換言之，副刊不如附刊那樣龐雜無定。上至編餘新聞、本埠事情，下至貨價船期，都可入為附刊。」副刊之所以為副刊，它至少應具備兩個要素，其一，副刊應具「有自身的獨特的文體選擇、作家群、讀者群和相對穩定的編輯特色」；其二，副刊應具有「整體上的文化或文藝的色彩。或者說，從形體到內容，都是文化和文藝的，並由此造成了頗具特色的文體，如連載、雜文、和在筆記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類小品文字……」之所以強調「整體」其中也暗含了一種「內容形式的和諧統一」的意思，「這就排除了綜合編輯法造成的一種現象：副刊文字散見各版，卻構不成副刊。」〔註7〕

「何為副刊」以及中國副刊的起源等等畢竟都是專業的媒體研究者所關注的問題，作為非專業的研究者可以避開不談，然而，認識和把握副刊所具有的若干特徵卻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某一特定副刊的認識——儘管嚴格說來我們面對的副刊並不純粹，而是如上所述，不可避免地摻雜了某些雜誌的特徵。從文學研究的角度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報紙副刊所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孫玉石先生指出：「現代文學許多現象的發生，作家許多作品最初的發表，除了文學雜誌以外，往往是以報紙文藝副刊為主要陣地的，報紙文藝副刊有它獨特的空間和影響。五四時代的『四大文學副刊』，1930年代的《申報·自由談》，20年代至40年代的《大公報》文藝副刊，都與新文學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它們的資源發掘，對於瞭解和研究現代文學的生成、作家的產生與傳媒的關係，作家、作品從產生到發表的原初過程，某些文類（如小品、雜文、散文、書評）的產生與傳播，文學思潮流派與作家風格的產生，文學創作的原生態面貌，文學作家、批評家、編輯與讀者互動共生的文化生態等等，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源，也為原創性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和動力源泉。」〔註8〕在目前的研究界，對於五四時代影響巨大的「四大副刊」，研究比較深入的是《晨報副刊》，已有多篇博士論文和其它研究成果出現，《京報副刊》也已有專門的博士論文出現，只有《時事新報·學燈》和《民國日報·

〔註7〕 馮並：《中國文藝副刊史》，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4頁。

〔註8〕 孫玉石：《報紙文藝副刊與現代文學研究關係之隨想》，載《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覺悟》的相關研究成果還比較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一點恐怕是資料的原因，「四大副刊」中只有《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有合訂本流傳至今，而且保存相對較完整，《晨報副刊》還有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的影印本，資料相對集中，也容易獲得，因而研究者也相對較多。而《學燈》和《覺悟》當時雖然也都有合訂本出版，但大部分都沒有流傳下來，研究起來難度較大。儘管人民出版社於 1981 年也影印了全套《民國日報》，但要把《覺悟》從堆積的報紙正張中分離出來進行閱讀、研究畢竟也是一項極艱苦的工作。事實上，要讀《覺悟》就要翻遍所有的《民國日報》，而且由於當時編者考慮裝訂合訂本的方便，在《覺悟》的版式設計方面動了許多腦筋，許多情況下，讀一期《覺悟》就要把厚厚的一巨冊《民國日報》顛來倒去地翻轉好多遍，這種閱讀上的困難無疑阻擋了許多研究者的腳步，因而時至今日相關的研究成果仍然較少。而且，目前所見大多數研究基本都集中於《民國日報·覺悟》在馬克思主義傳播、以及政治、廣告方面做出的努力，而有關《覺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革命中的作用等等則關注不多。從中國知網檢索結果可知，目前只有 2005 年的西南師範大學楊炯的碩士論文和 2010 年復旦大學杜竹敏的博士論文是從文藝角度切入對《覺悟》進行研究，其餘單篇研究論文也比較少。而在筆者寫作博士論文（2005~2009）期間，杜的博士論文則尚未面世。2011 年華中師範大學員怒華的《四大副刊與五四新文學》博士論文，雖也涉及到了《覺悟》，但並非研究《民國日報·覺悟》的專論。因此，時至今日，學界對曾經位列對新文化運動影響巨大的「四大副刊」之一的《覺悟》研究仍然是不夠的。

《民國日報》於 1916 年 1 月 22 日（註 9）創刊於上海，是中華革命黨在國

〔註 9〕 1919 年 12 月 30 日《民國日報》刊出《本報紀念增刊擴張篇幅預告》，其中對於《民國日報》的歷史有所回顧：「本報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袁世凱稱帝的時候出版的，到了現在，雖受了許多的困難，僥倖還沒有短命，已經過了第四個週年了，我們現在就趁此慶賀民國九年新年的機會，同時舉行本報四週年紀念。在元旦的一天發行『紀念增刊』並且從這一天起擴張篇幅，把『覺悟』欄專印大半張。此外電報新聞等類亦竭力擴張，以副社會的要求……」按照這裡的說法，《民國日報》則應該是創立於 1915 年 12 月 20 日。另外于右任、姚婉雛所撰的《葉楚傖先生墓碑記》也有「四年，民國日報創成，君任總編輯，邵君力子為經理」的記載（于右任、姚婉雛：《葉楚傖先生墓碑記》，見《葉楚傖詩文集》（葉元編），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分店 1988 年 1 月版，第 9 頁。）這裡大概是陰曆陽曆的區別，1916 年 1 月 22 日對應的陰曆則是民國四年（1915）年 12 月 18 日。

內主要的言論陣地。由陳其美集資創辦，主編為葉楚傖，邵力子是經理。主要撰稿人為戴季陶、沈玄廬等。《民國日報》雖然是在《生活日報》的基礎上創辦的，但若從其編輯成員來看，其淵源卻可以上溯至「三民報」以至《神州日報》。1907年4月2日，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主辦的《神州日報》在上海誕生，發刊詞中鼓吹「神州社會主義」、「神州國家主義」、「神州帝國主義」等三大主義，「和同盟會綱領相呼應，以喚醒沉睡的神州」，然而不幸於1908年8月整個報館毀於大火。接著，于、邵二人又募集資金於1909年5月15日創辦《民呼日報》，以「大聲疾呼，為民請命」為宗旨，自稱是「人民的呼聲」。由於該報立足於揭露清朝政府官員貪污腐化，遭到當權者的嫉恨和誣告，被迫於8月14日停刊，僅僅存在了92天。《民呼日報》被封後僅僅20天，于右任、邵力子便又迅速行動，委託法商出面登記並創辦了《民吁日報》，但很快由於披露日本意圖侵略滿洲進而吞併整個中國的陰謀而遭到日方抗議，向清政府上海道施加壓力，於是上海道蔡乃煌會同租界當局於11月19日蠻橫地查封了《民吁日報》。這份報紙僅僅存在了48天。《民吁日報》被封後，邵力子曾赴陝西高等學堂任教，旋因宣揚進步思想遭到陝西巡撫的嫉恨，拉攏不成竟欲施以毒手，邵力子只好再次返回上海，並於1910年10月11日跟于右任創辦了《民立報》。同前幾份報紙一樣，《民立報》仍然是于右任為社長而邵力子負責報紙經理。有了前面辦報的經驗教訓，于右任、邵力子採取「銳而不露」、「隱中求明」的宣傳手法，終於使報紙穩定下來。先後擔任《民立報》主筆的有宋教仁、邵力子、呂志伊、范鴻仙、徐血兒、章士釗等人。1911年7月31日，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于右任、邵力子、宋教仁、陳其美、范光啓、呂志伊等參加，並決定將《民立報》作為其機關報。後來《民立報》在「宋教仁案」、「二次革命」等過程中都發揮了其進步作用，也正因如此，隨著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民立報》也於1913年9月4日被禁停刊。《民呼日報》、《民吁日報》和《民立報》便是當年赫赫有名的所謂「三民報」。《民立報》被禁之後，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很快又在上海辦起《生活日報》，繼續鼓吹反袁鬥爭、倡揚革命。1916年1月，在袁世凱忙碌準備「登極」之時，為增強輿論宣傳、反對袁世凱的倒退復辟，邵力子與葉楚傖等人又在《生活日報》的基礎上創立《民國日報》。〔註10〕可見，《民國日報》是與上述各報一脈相承的。

〔註10〕關於《神州日報》及「三民報」的有關論述參考朱順佐：《邵力子》第三章「辦報生涯」，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41～70頁。

1920年1月1日，《民國日報》出版四週年紀念增刊，國民黨元老吳敬恒也特意撰文指出《民國日報》同《民立報》的承繼關係：「……民國日報，是民立報的後身，因為主持這報的幾位先生，就是民立報當年的幾位中堅人物，他是一個貫徹民立報主張的，他是逐漸把民立報進步的……為什麼說他是貫徹民立報主張呢？民立報是一個民黨最初發表總意志的機構，所以民立報主張也就是民黨初衷所抱的主張。不知民立報活到今天，到底如何。因為民立報夭折以後，民黨要用苦肉計，感動官僚，於是藏了他的初衷……惟有民國日報把民立報復活，始終堅持民立報在亡清末年及民元的主張，絲毫不肯讓步……」（註11）按照吳敬恒的說法，《民立報》是「發表民黨總意志的機構」，是國民黨的所謂「機關報」，而《民國日報》是《民立報》的後身，自然也就接續了「機關報」的角色。

眾所周知，政黨的機關報是宣傳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的工具，從性質上來說是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的，不符合本黨黨見的理論、觀點如要在黨報上出現，恐怕只能作為分析批判的對象，而絕無可能不加區分地同本黨所信賴的主義、思想平等地出現在黨報上。黨報的這一性質也決定了其受眾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儘管一個政黨可以借助其它力量來推廣其機關報，並盡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引導輿論，但這種「一黨之言」要獲得不同階層、不同領域的民眾的廣泛認可，還是不太可能做到的，除非這個政黨真正代表了「最廣泛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然，在排他性問題上，執政黨的黨報與非執政黨的黨報也存在著差異，相對來說，執政黨的黨報排他性更強，而非執政黨的黨報由於其監督和批判的立場，則常常能夠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包容性。

在清末民初，軍閥割據，國民黨（1914年7月8日，重組為「中華革命黨」，1919年10月10日復名「中國國民黨」）尚未成為執政黨的前提下，《民國日報》的總體面貌是進步的、革命的，辦報理念也比較開放。所以儘管它是所謂一黨之「機關報」，但仍然受到了廣大讀者和群眾的支持。在成立之初，《民國日報》即在「發刊詞」中表示當此「帝制獨夫暴露之春，海內義師義起之日……而民國日報乃大聲疾呼以興」，（註12）並從三個方面向同胞呼籲維護共和、發揚民治、反袁護國，在當時的情勢下呼籲反對袁世凱復辟、維護

〔註11〕 吳敬恒：《民國日報與世界的進化》，載1920年1月1日《民國日報紀念增刊》。

〔註12〕 袁：《本報發刊辭》，載1916年1月22日《民國日報》。

共和無疑是極具進步意義的，也得到了廣泛的響應。當然，將《民國日報》的影響發揚光大，並使其在中國報刊史以及文化史和文學史上留下重重一筆還是 1919 年 6 月創辦的副刊《覺悟》。《覺悟》創辦於五四的聲浪中，堪稱「五四之子」，在五四新文化的語境裏，它積極傳播新文化、鼓吹和實踐文學革命、同各種封建守舊思想作鬥爭，成為無數「新青年」所信賴的精神導師和思想食糧。與同在上海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以及北京的《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一起，被稱為新文化運動中著名的「四大副刊」。

1978 年，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的《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上冊曾以將近 40 頁的篇幅來介紹《民國日報·覺悟》，儘管現在看來這篇長文主要是試圖對《覺悟》之宣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作一歷史評價，對其追求「進步」與「表現欠佳」的方方面面做出詳細評述，其中的大量描述都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價值評判也不無偏激和可探討之處，但其對有關史實的整理還是相當嚴謹和紮實準確的，時至今日也沒有研究者能夠對之做出更為翔實可靠的描述。在此我把其對《覺悟》的史實描述照錄在這裡：

「覺悟」的確切創刊日期不詳（我們已見最早一期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無發刊詞，內容也不像是創刊號），從創刊到一九二四年，版式幾度改變。一九一九年底以前，每期只占四開一版的大半頁，一九二〇年起篇幅擴大為四開兩頁；五月二十日起，為了讀者保存的方便，改成單行的八開四頁，隨報附送，並從七月起每月發行彙刊單行本；一九二四年二月起又改為十六開八頁，五月以後擴大為十六頁，這種形式一直維持到一九二八年底，以後的「覺悟」還未見到。隨著版式和內容的改變，「覺悟」的分欄也有增減。一九一九年的「覺悟」不分欄，內容以論文為主，其中譯文占很大比重。一九二〇年後篇幅擴大一倍多，開始分欄，常設各欄為：評論、講演、選錄、譯述、詩歌、小說、通訊、隨感錄等，此外還有參考資料、勞動問題、社會調查、平民血淚、旅東隨感錄等欄。一九二四年二月改版以後，論文比重增加，而原來占很多篇幅的文藝作品、通訊和隨感錄則大為縮減。

除了「覺悟」以外，「民國日報」還出版了不少種其它的副刊。一九二〇年五月出版的「平民」周刊，是復旦大學商學院師生編輯的：

一九二一年八月創刊「婦女評論」周刊，由「婦女評論」社編輯；一九二三年四月創刊「藝術評論」周刊，七月創刊「文學旬刊」，八月，「婦女評論社」和「婦女問題研究社」合作，在出完一〇四期後，創刊「婦女周報」，十一月創刊「政治評論」（旬刊）。本是每日出版的「覺悟」，每逢這些副刊出版的日子就停刊。一九二二年十月開灤五礦罷工發生時，「民國日報」出版了六期「唐山潮聲」，算是臨時性的不定期副刊。「民國日報」成為國民黨的機關報後，專門成立一個副刊部來改進和擴大副刊，除把「覺悟」定位甲種副刊，仍舊逐日出版外，在原來的各種周刊（旬刊）基礎上，出版了七種乙種副刊（周刊）：科學、藝術、文藝、婦女、教育、政治、平民。此外還有星期特別副刊「評論之評論」（一九二四年三月創刊），特約附送周刊「國學周刊」，共十種。一九二四年五月，這十種副刊都已出齊，到一九二四年十月，除婦女周報外，全部停刊。一九二五年四月又創刊「文學」周刊，由上海大學文學系編輯（一九二五年六月第六期出版後停刊）。一九二四年八月起，「覺悟」每周出「非基督教特刊」一次，是「非基督教大同盟」的機關刊（一九二五年三月出完第二十五期後停刊）；十二月起，每半月出「社會科學特刊」一次，由武昌師範大學歷史社會學研究會編輯（一九二五年六月出完十五期後停刊）。以上這些刊物都是在「民國日報」向右轉以前出版的，有些更由共產黨員負責或參加編輯，因此內容基本上是進步的。一九二五年十月又創刊了一種文藝性的周刊「黎明」，則是嚴重脫離實際的，並且帶有頹廢色彩，這是和整個報紙的變質相適應的。（註13）

上面這段文字已經大致勾勒出了1926年以前的《覺悟》和《民國日報》上曾經設立過的其它副刊的發展概況。1920年《民國日報》四週年慶過後，《覺悟》改版，篇幅擴張，也開始分欄，在「評論」、「講演」、「譯述」、「詩」、「小說」、「通信」、「隨感錄」等欄目中，「評論」、「講演」和「譯述」大致顯示了《覺悟》的雜誌特徵，而後面幾個欄目則是日報副刊應有的特色。1920年代早期，《覺悟》的「講演」欄中曾大量登載羅素、杜威等人的哲學講演以及蔡元培、

〔註13〕《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 上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11月版，第183～185頁。

胡適、章太炎、李大釗等人國學、史學等方面的講演，而汪馥泉譯的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潮論》、木間久雄的《新聞學概論》，沈澤民譯的小泉八雲的《文藝研究》，也都曾在《覺悟》的「譯述」欄連載，其它關於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思潮的譯述，《俄國婚姻律全文》、《英國勞動運動三十年發達史》以及《世界史略》等等也都譯成中文在《覺悟》上連載。這些大量宣傳某種思潮的論著使得《覺悟》部分地具有了雜誌的功能，以至於直到今天，許多研究者在提到《覺悟》時，首先談到的還是它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所做出的貢獻。然而正如《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中所說的，「作為報紙的綜合性副刊，『覺悟』上的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佔了相當大的比重，特別是白話小說和新詩，幾乎期期都有，」對新文學的推動也是《覺悟》的重要職能之一。當然，《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的編者是對《覺悟》上的文學作品與文學評論不以為然的，甚至流露出對《覺悟》未能辦成像 1923 至 1926 年間出版的《新青年》季刊或不定期刊那樣專門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刊物而大為惋惜的意思。因此，對於《覺悟》上的文學作品，也理所當然地從現實政治出發進行考量：一方面認為這些作品「雖然思想性和藝術水平不算太高，但在當時不能不說是進步的嘗試，其中像劉大白的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另一方面也從「思想性」、「革命性」上給予某種程度的肯定：「就內容講，這些作品大部分是現實主義的，表現了對於改造社會的強烈願望，革命的決心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一部分雖然只是傾訴個人的哀愁，也多少反映了時代的動蕩與不安；完全脫離現實的無病呻吟或美化舊社會的作品還是極少數。『覺悟』的這一部分雖然沒有正面涉及政治，但是為現實的政治鬥爭服務的。」（註 14）

的確，《覺悟》上也發表了數量較為可觀的文學作品。《覺悟》上出現的主要作者有邵力子、葉楚傖、劉大白、陳望道、徐蔚南、沈玄廬、施存統、查猛濟、陳德徵、許紹棣、許傑、何心冷、白採、孫俚工、譚正璧、曹聚仁、魏金枝、張春浩、吳組襄（湘）……等等。邵力子在《覺悟》上發表了上千篇短小精悍、寸鐵殺人的雜文，葉楚傖、劉大白、陳望道、施存統諸君也各有大量雜文發表，1925 年邵力子離開《覺悟》後，陳德徵、許紹棣也發表了

（註 14）《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 上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78 年 11 月版，第 213 頁。